

沈约“起家奉朝请”的时间新考

柏俊才

《梁书·沈约列传》云“起家奉朝请”，但未载具体年月，故关于沈约为奉朝请的时间，争议颇大。严可均以为在孝建中（454—456）（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）；铃木虎雄认为在大明四年（460）（《沈约年谱》）；王达津先生认为在泰始元年（465）（《沈约评传》）；刘静夫先生认为不可考（《沈约评传》）；林家骊先生认为在大明四年（460）或大明五年（461）四月之前（《沈约研究》）。综合以上诸位先生之说，在研究沈约“起家奉朝请”的时间问题上，有下列三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：一是沈约与沈庆之的关系，二是沈约与沈文季的关系，三是蔡兴宗大明三年与沈约的交往。故我们不妨首先从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开始。

沈庆之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位高权重，极有可能是推荐沈约的人选。然沈庆之与沈约的关系，史书无载，我们难以妄加推断。沈约现存有《为始兴王让仪同表》一文，“始兴王”是否为“始兴公”之误，目前无资料可证。如果“始兴王”确实是“始兴公”之误，那么这里的“始兴公”就是指沈庆之。沈庆之曾封始兴公，果真如此，就有诸多难解之事：《宋书·孝武帝本纪》云：“（孝建元年六月）甲戌，抚军将军柳元景进号抚军大将军，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并开府仪同三司。……（孝建二年二月）丙寅，以镇北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……（大明三年四月）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讨诞。”则沈庆之封始兴公在孝建元年（454），“让仪同”之事最晚在大明三年（459）。此年沈约十九岁，在家乡抑或在京师，不得而知。如果在家乡，如何能够替朝廷大员作文；如果在京师，沈约此时未授官职，沈庆之官至宰相，麾下文人如林，怎么会让一个未出茅庐的后生替他代笔？如果此文是沈约替沈庆之所作，那么说明沈约与沈庆之有交游。然沈约在诗文中无一字提及沈庆之，这就令人生疑。沈庆之当时官至宰相，完全有能力举荐沈约为官。然据《梁

书》以及《南史》沈约本传所载，沈约首先入蔡兴宗幕府而非沈庆之幕府，这就更让人不可思议。因此，沈约与沈庆之的关系不可考，试图寻证沈庆之举荐沈约的路子是行不通的。

沈文季为沈庆之次子，比沈约小一岁，二人确实为同时代人。《南齐书·沈文季列传》云：“大明五年，封文季为山阳县五等伯。转太子舍人，新安王北中郎主簿，西阳王抚军功曹。”大明五年（461），沈约作《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》，此仅能说明大明五年，沈约与沈文季同在西阳王府，此年前他们是否相识我们无从得知。沈约在永元元年（499）所作的《沈文季加侍中诏》中有“鉴识超凡”四字，这是沈约替东昏侯所拟的诏书，是客套话，不可能牵扯到沈约对沈文季以及乃父沈庆之的感情。

沈约与蔡兴宗的关系极为密切，史书所载甚详。然大明三年二人之交往，却难以考索。《宋书·蔡兴宗列传》云：“竟陵王诞据广陵城为逆，事平，兴宗奉旨慰劳。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，在城内同诛。兴宗至广陵，躬自收殡，致丧还豫章旧墓。上闻之，甚不悦。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，锁付宁州，亲戚故人，无敢瞻送；兴宗在直，请急，诣朗别。上知尤怒。坐属疾多日，白衣领职。寻左迁司空沈庆之的长史，行兖州事，还为廷尉卿。”大明三年七月，蔡兴宗奉命赴广陵犒劳军队，因埋葬旧友范义、饯别挚友周朗而获罪。此时蔡兴宗自身难保，为待罪之身，恐无暇顾及其他。前已考证，沈庆之并不一定认识沈约。那么，蔡兴宗也不可能从沈庆之那里了解到沈约。

综上所述，前贤所论之证据不足，故他们的结论亦难成立。笔者以为，沈约“起家奉朝请”的时间还得重新考证。

《后汉书·孝和帝本纪》李贤注云：“奉朝请，无员，三公、外戚、宗室、诸侯多奉朝请。汉律‘春曰朝，秋曰请’。”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功大者食县，小者食乡、亭，得臣其所食吏民。后避武帝讳，为列侯。武帝元朔二年，

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，国家为封，亦为列侯。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，位次三公。”《晋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奉朝请，本不为官，无员。……奉朝请者，奉朝会请召而已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四三《职官部》引《汉官解诂》曰：“三辅职如郡守，独奉朝请。成帝丞相张禹逊位，特进奉朝请。又以关内侯萧望之奉朝请。奉朝请之号则非为官。如淳曰：‘诸侯春朝天子曰朝，秋曰请。’虽国戚及勋门子弟为之，但预朝请会而已。”由上列诸材料来看，奉朝请无人员限制，故各朝奉朝请人数差别很大，像齐武帝永明中，奉朝请多达六百余人。奉朝请不是官职，只是朝廷给予的一种资格，可参与朝会。三公、外戚、宗室、诸侯、勋门子弟等均有“奉朝请”的资格。自汉代始，三公、外戚、宗室、诸侯之子出仕前均有奉朝请之任。

沈约《与徐勉书》中有云：“岁逾十稔，方忝襄阳县。”此言自己入仕到任职襄阳时“逾十稔”，此为沈约自叙当为可信。沈约何时到襄阳，史书无载，但可考知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五七六《乐部》十四引《襄沔记》云：“齐文惠临州，吴兴沈约奉教聘引，并不降志，约乃共论文章，宣仲辄言庄老。既各言其志，不能相屈。”则文惠太子任职襄阳时，沈约随之到任。文惠太子任职襄阳的时间《南齐书·文惠太子列传》有载：“升明三年，太祖将受禅，世祖已还京师，以襄阳兵马重镇，不欲处他族，出太子为持节、都督雍梁二州、郢州之竟陵、司州之随郡军事、左中郎将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”终文惠太子一生，赴襄阳者仅这一次，沈约一生到襄阳有明确记载的也只有这一次。沈约升明三年（479）至襄阳，则其入仕大约在泰始五年（469），正好“逾十稔”。此前沈约之行踪，诸种年谱都认为泰始三年（467）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之外兵参军，兼记室，此虽已入仕，然其初仕的时间恐非在此时。泰始三年之前沈约的行踪，已难考知。那么，沈约“起家奉朝请”的时间最晚当在泰始三年（467）之前。

《宋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奉朝请，无员，亦不为官。……孝建初，奉朝请省。驸马都尉、三都尉秩比二千石。”据此，“孝建初”已省奉朝请，此后一直未封奉朝请。孝建为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，仅存在了三年，指公元454—456年，“孝建初”不知指何年。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笔者遍检《宋书》、《齐书》、《梁书》，刘宋封奉朝请者共三十七人，即郑黑、孔玉、徐道娱等人。在时间上可分为二类，一为大明元年（457）之前，二为泰始元年（465）以后。这说明刘宋朝的奉朝请在孝建年间曾停封，泰始元年又重新恢复。因此，沈约为奉朝请的时间要么在大明元年

以前，要么在泰始元年以后，但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年间（457—464）。据笔者所考，沈约大明五年入西阳王子尚幕府，泰始三年入蔡兴宗幕府。那么，沈约“起家奉朝请”的时间只能在大明元年前，亦即奉朝请被废之孝建年间。

就沈约自身来看，孝建年间“起家奉朝请”是极有可能的。在奉朝请任职的诸种资格中，沈约只可能以勋门子弟的身份“奉朝请”。沈约祖父沈林之曾因佐刘裕建宋有功，被封汉寿县伯，食邑六百户。永初三年（422）薨，追赠征虏将军；沈约之伯父沈劭曾任钟离太守、安成相等职；沈约之父沈璞，曾任盱眙太守、淮南太守等职，后因奉迎世祖迟而被诛。沈璞被杀，沈约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东躲西藏的犯人家属。世祖孝武皇帝刘骏即位后二年，即孝建二年（455）颁布赦免诏书：“（九月）庚戌，诏曰：‘国道再屯，艰虞毕集。朕虽寡德，终膺鸿庆。惟新之祉，实深百王；而惠宥之令，未殊常渥。永言勤虑，寤寐载怀。在朕受命之前，凡以罪徙放，悉听还本。犯衅之门，尚有存者，子弟可随才署吏。’”（《宋书·孝武帝本纪》）在这道诏书中我们要特别注意“犯衅之门，尚有存者，子弟可随才署吏”一句话，沈约就属于此例。就此看来，沈约不仅可以被赦免，结束潜窜的生活，而且可以“随才署吏”。因此，孝建二年，沈约恢复了勋门子弟的身份，“起家奉朝请”。

在沈约恢复了勋门子弟的身份、“起家奉朝请”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人为的障碍呢？如果说有的话，这个人就是此时执掌大权、与沈约父子命运攸关的颜竣。《宋书·自序》云：“会二凶逼令送老弱还都，璞性笃孝，寻闻尊老应幽执，辄哽咽不自胜，疾遂增笃，不堪远迎，世祖义军至界首，方得致身。先是，琅邪颜竣欲与璞交，不酬其意，竣以致恨。及世祖将至都，方有谗说以璞奉迎之晚，横罹世难，时年三十八。”则颜竣乃沈约杀父仇人，有不共戴天之恨。那么颜竣会不会横加干涉、设置藩篱阻止沈约进入士流呢？

笔者曾反复阅读《宋书》，以为颜竣诬陷沈璞恐有深层的原因。颜竣，字士逊，琅邪临沂人，光禄大夫延之子，是刘骏的心腹。刘骏是文帝刘义隆之三子，凭借非常之谋登上王位。沈氏乃刘骏之祖裕、父义隆恩遇之旧族，作为开国元勋的林子，武帝、文帝二代国君是非常依赖的，“武帝每征讨，林子辄推锋居前”、“文帝出镇荆州，议以林子及谢晦为蕃佐。帝曰：‘吾不可顿无二人，林子行则晦不宜出。’”（《南史·沈约列传》）太祖文皇帝诏见沈约

伯父沈劭时“悲不自胜”（《宋书·自序》），沈约之父沈璞，“太祖引见，谓曰：‘吾昔以弱年出蕃，卿家以亲要见辅，今日之授，意在不薄。王家之事，一以相委，勿以国官乖清途为罔罔也。’……太祖从容谓始兴王曰：‘沈璞奉时无纤介之失，在家有孝友之称，学优才赡，文义可观，而沉深守静，不求名誉，甚佳。汝但应委之以事，乃宜引与晤对。’潜既素加赏遇，又敬奉此旨。……以疾去职。太祖厚加存问，赏赐甚厚。潜出为南徐州，谓璞曰：‘潜既出蕃，卿故当卧而护之。’与潜诏曰：‘沈璞累年主簿，又经国卿，虽未尝为行佐，今故当正参军耶。若尔，正当署余曹，兼房任，不尔便宜行佐正署中兵，恐于选体如不多耳。’”（《宋书·自序》）刘骏是革父命而登基的，要想坐稳皇位，当然要打击朝中旧有的势力，沈璞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。故笔者疑沈璞被杀，乃刘骏授意颜竣所为。沈约并不是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官，“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《宋书》，拟立《袁粲传》，以审世祖。世祖曰：‘袁粲自是宋家忠臣。’约又多载孝武、明帝诸鄙渎事，上遣左右谓约曰：‘孝武事迹不容顿尔。我昔经事宋明帝，卿可思讳恶之义。’于是多所省除。”（《南齐书·文学列传》）果真颜竣乃杀父凶手，恐《宋书·颜竣列传》当罗列颜竣诸多“鄙渎事”，然却没有，读《宋书·颜竣列传》我们并不憎恨他，相反有些喜欢：“竣藉蕃朝之旧，极陈得失。上自即吉之后，多所兴造，竣谏争恳切，无所回避，上意甚不说，多不见从。”（《宋书·颜竣列传》）颜竣是一个难得的仗义执言之诤臣。

颜竣于孝建元年（454）任吏部尚书，始掌握朝政

大权，然不可能为所欲为。“会世祖即位，任遇无改，除（何偃）大司马长史，迁侍中，领太子中庶子。……改领骁骑将军，亲遇隆密，有加旧臣。转吏部尚书。尚之去选未五载，偃复袭其迹，世以为荣。侍中颜竣至是始贵，与偃俱在门下，以文义赏会，相得甚欢。竣自谓任遇隆密，宜居重大，而位次与偃等未殊，意稍不悦。及偃代竣领选，竣愈愤懣，与偃遂有隙。竣时势倾朝野，偃不自安，遂发心悸病，意虑乖僻，上表解职，告医不仕。世祖遇偃既深，备加治疗，名医上药，随所宜须，乃得瘥。时上长女山阴公主爱倾一时，配偃子载。”（《宋书·何偃列传》）“世祖践阼，以（颜竣）为侍中。”（《宋书·颜竣列传》）饶有兴味的是，世祖孝武皇帝刘骏于元嘉三十年（453）四月即位后，封何偃为侍中，同时封颜竣为侍中，后又封何偃为吏部尚书。尽管何偃官比颜竣高，但惧怕颜竣的势力，世祖又赐婚何偃之子。很显然，世祖想借何偃来牵制颜竣。孝建元年，颜竣任吏部尚书，世祖又封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开府仪同三司来分其权。大明三年（459），世祖借他人之手处死颜竣。在对待心腹之臣颜竣上，世祖很讲究策略。

因此，颜竣不可能成为沈约恢复其勋门子弟的障碍。事实上，他也没有形成障碍。孝建二年，世祖发布《宥罪诏》，沈约被赦免，不久，便“起家奉朝请”。大约沈约搭上了末班车，在孝建二年（455）“奉朝请”废除之前得到“奉朝请”的资格。此说正与严可均之说相接近，严氏虽未考证，但其敏锐的洞察力却令我们后人钦佩。

[作者单位：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]

钟嵘所任“征远记室”主官考

李思清

《诗品》诸多版本题署“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”，历来学者对此不太留意。逯钦立先生则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线索，他在《钟嵘诗品丛考》及《诗品考实》（未刊手稿）两文中均谈到：“‘征远记室’一职不见本传，而此书有之，当非后人妄加。使果隋唐旧本亦有此署，则见钟嵘且卒于征远记室，而不卒于西中郎晋安王

记室。惟此征远将军究系何人，暂亦未能得之，存疑可耳。”（逯钦立《诗品考实》，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）2003年，王发国先生再度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他认为，“征远记室”是钟嵘的另一次任职，其主官是明山宾，时间“在任宁朔记室之后，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之前”（王发国《钟嵘年谱疑义考析——仕履篇》，《西南民族学院